

敦煌佛教疑伪经与唐五代民间讲唱

王晶波¹ 张勇健²

(1.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12;

2.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民间讲唱从产生、发展的过程到讲唱的内容、形式,都与疑伪经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敦煌疑伪经的讲唱,不仅构成了唐五代民间讲唱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一定的主题类别与讲唱模式,对宋以后的民间讲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用敦煌存疑伪经和唐五代民间讲唱作品,理清二者关系及其互构模式,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疑伪经与民间讲唱的关系,同时也为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关键词:疑伪经 讲唱 主题 传播 唐五代

中图分类号: K870.6; B9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5) 04-0055-12

疑伪经是相对于佛教“真经”或“正经”的一个概念,合指那些假托佛说的“伪经”及真伪难辨的“疑经”^①。历史上的疑伪经,大多是中土人士为一定的宗教或现实目的,假托佛陀名义编纂、改写或杜撰而成,是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类典籍。疑伪经的产生与流传,几乎伴随着汉译佛经在中国传播的整个过程。因其思想内容不合教义正统,自东晋道安以来,诸多佛教学者致力于甄别辨伪,摒除那些不合经义正统、来历不明的典籍,并在经录中予以专门著录^②。终其发展历史,疑伪经一直遭到佛教主流的排斥抵制,长期以来被摒弃于大藏经之外,以致于绝大部分都亡佚不存。

不过,就历史实际而言,疑伪经虽然受到主流佛教的排斥,但由于它既迎合了本土

收稿日期: 2025-05-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疑伪经的民间讲唱研究”(23AZW01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重大项目“敦煌佛教疑伪经全集整理与研究”(22JZD027);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敦煌学学科体系构建研究”(2023ZDWY04)

作者简介: 王晶波(1964-),女,吉林洮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与古典文献学研究。张勇健(1996-)男,安徽郎溪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敦煌学研究。

① 此处借用了方广钊先生给出的一个简便定义。参方广钊《〈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序言》,见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方先生在《从“文化汇流”谈中国佛教史上的疑伪经现象》一文中又重申了这个说法,并加以详论。参方广钊著《疑伪经研究与“文化汇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7-135页。

② 赵青山《中土佛教疑伪经目概述》,《敦煌学辑刊》2020年第3期,第71-80页。

信众的宗教信仰需求与生活实际内容，同时又吸纳了中国本土文化因素，更贴近中国民众的思想内涵与道德要求，因而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民间影响实为深远。虽然从“佛经”的意义与形式来看，这些疑伪经确实大都失传，但由之演化或发展而出的内容和余脉则在民间长期流传，成为民间通俗文化与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民间讲唱对疑伪经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敦煌藏经洞所存 130 余种南北朝至宋初的疑伪经写本，正是探究该时期疑伪经面貌及其影响的宝贵资料。

民间讲唱是一门古老的通俗文学形式，隋唐以来蓬勃发展，讲唱作品受到社会上下层民众的广泛欢迎。而这一阶段也正是佛教发展的繁荣时期，佛教俗讲、唱导等方式深刻影响了民间讲唱，学界普遍认为唐代讲唱文学来源于俗讲。今存敦煌俗文学的主要部分，如讲经文、变文、因缘、话本、故事赋、词文及斋愿仪式文等，大多采用讲唱形式，其中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题材与观念，无疑出自于佛教，但细细考察起来，这些作品所讲唱的具体内容、故事题材与方式，则与疑伪经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它们有的是直接由疑伪经衍化而成，有的则是受疑伪经影响而来，如目连变、降魔变、地狱变、报恩经讲经文等，显示出疑伪经对唐五代讲唱文学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纵观讲唱文学历史，疑伪经不仅影响了唐五代的民间讲唱，也同样影响了后来宋元明清时期的民间讲唱，话本、小说、词话、鼓书、宝卷和民间善书中与疑伪经有关的内容非常多，并形成了重要的主题类别，如目连救母、地狱十王、孝道报恩、菩萨信仰、忏法斋仪等。可以说，民间讲唱文学从产生、发展的过程以至讲唱的内容、形式，都与疑伪经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利用敦煌所存疑伪经和唐五代民间讲唱作品，对二者的关系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疑伪经与民间讲唱的关系，认清二者互动互构的动态进程，同时也将为全面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提供一个有益观察视角。

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学界对古代民间讲唱的界定多从较宽泛的文学概念出发，将变文、因缘、话本、小说、词文、宝卷等纳入其中，这无疑是恰当的。但敦煌文献中尚有其他具有讲唱特征的作品，包括部分疑伪经，常被排除在讲唱文学范畴之外。其实，从广义的文学概念来看，佛典大多具有文学性质^①，模仿佛经而成的疑伪经亦不例外，其中以讲唱为主要传播方式的疑伪经，就其内容、形式与应用场合而言，理应被纳入广义文学范畴。因此，本文对民间讲唱概念的应用，主要从广义文学（也可称文化文学）出发，不仅关注传统民间讲唱中的话本、变文、小说、词话、宝卷、俗赋、故事等作品，也关注以往被排除在讲唱文学之外的，以讲唱形式传播的疑伪经及其他的宗教、文化作品，以求更全面地认识唐五代民间讲唱的历史发展及其促动因素。

^① 孙昌武的《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一文，曾对佛典的文学性加以详论。见氏著《佛教与中国文学》（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一、敦煌疑伪经与唐五代民间讲唱的关系

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发展最盛的阶段，也是疑伪经大量产生之时期。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分“疑惑录”和“伪妄录”两个部分，著录了将近四百种疑伪经（除去重复），可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疑伪经数量非常之大。但由于正统佛教的抵制，凡被智昇判定为“疑惑”“伪妄”者都被摒出大藏经之外，不得入藏，因而绝大多数的此类经典都逐渐亡佚不存。敦煌所见的一百多种疑伪经，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流传，并于此时段的前后逐渐失载、亡佚。

就佛经形成的历史而言，佛法最初由佛陀口传、弟子记诵，并无文字记载。佛陀涅槃后，为防教法散佚，弟子们集会诵出，共同整理成文，形成了最早的佛经。此后又历经数次结集，才逐步完备为今日所见的三藏典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以文字形式呈现的佛经文献，本身就是口语讲述的背诵转写，它们虽然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字传承、翻译转述以及增益修饰，但其表述内容、形式、语言特点，还是与口语表达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孙昌武先生指出，佛典的文学性质体现在三个方面：内容上注重解决人生实际问题，多以形象方式启发听众，兼具宗教与艺术思维；方法上善用譬喻、故事与事例，增强语言的艺术性；形式上采用当时流行的韵文诗偈，便于记诵。传入中土后，经无数译师努力，形成华梵（胡）结合、雅俗共赏、韵散兼行的译经文体，进一步展现了佛典的文学特性。^①

中土出现的疑伪经既是模仿佛经而来，它的内容、语言形式、叙事风格、表现手法，虽然竭力表现得像是翻译经典一样，但与佛经一样具有口语表达的特点，并且基于某些特定或实用的宗教与社会目的，更注重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矛盾，适应中国民众的接受习惯，直接针对人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加以展开，较少纯粹的义理思辨内容，善于用具体形象的事例加以比喻或劝诫，并结合运用诗歌偈颂等韵文，形式灵活多样，借用各种流行方式加以传播。因而，从广义的文学概念来看，疑伪经与正统的佛典一样，也具有文学的性质特点。

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疑伪经，中外学者根据历代经录的记载和敦煌所存经文，结合佛教历史，从编撰目的、经文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过考察，并划分为数种类型。如汤用彤将六朝时期疑伪经的产生大略分为神授、欺世诈财、取材于图讖方术、与道教竞争、忏悔灭罪与末法信仰等数种^②；牧田谛亮将佛教疑伪经归纳为六类，即：附和统治者之意的、批判统治者施政的、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伦理的、鼓吹特定教义信仰的、标

^① 孙昌武《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见氏著《佛教与中国文学》（第2版），第1-50页。

^②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8-482页。

示当世特定人物之名的，以及满足疗病、祈福等迷信需求的^①；殷光明也有过大体相似的考察分类；王孟则按编纂目的，将敦煌疑伪经划分为指导规范佛教僧俗生活、宣扬特定教义信仰、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解决人们现实苦难等四类^②。

在这些类别中，那些宣扬特定佛教教义与实践以及调和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疑伪经，因其内容特点，往往会采用更适宜于民间传播的文字或口头方式进行宣传，因而与民间讲唱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中不少在唐五代时已成为讲唱文学的重要内容。梳理敦煌疑伪经与唐五代民间讲唱作品，可以发现，许多民间讲唱作品与疑伪经的内容、形式相同或相似，二者之间已然形成相互对应的紧密关系。依据内容、形式及传播方式等方面的特点，笔者将疑伪经与民间讲唱的关系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直接用于讲唱的疑伪经

这类作品，包含那些本身即以讲唱形式传播的疑伪经，以及在斋会等仪式上念诵、吟唱的仪式性的疑伪经文。它们本身是疑伪经，又主要通过讲唱的形式传播应用，二者的内容、形式合而为一，本身即是佛教俗讲或唱导的直接体现。

这类伪经的代表，首推《太子成道经》。敦煌本《太子成道经》自公布以来，一直被当作变文或讲经文看待，研究者往往注重其文学特征而忽略其伪经性质。该经在唐代经录中已有著录，均收入伪经录^③。敦煌存有十余件写本，相关的讲唱作品数量更多。该经未按佛经三分的形式呈现，而是从介绍佛陀前世中历百千劫而舍身求法、发愿苦行的经历开始，然后以韵散结合的形式，讲唱释迦牟尼乘象入胎、树下降生、成家及出家修道的情形，主要内容由《佛本行集经》中化出，情节也与常见的“八相成道”一致，但具体内容又有许多不同，已是中国化的佛传故事。其中载太子诞生一节：

不旬日之间，便即夫人有孕。虽然怀孕十月，却乃愁忧。遂奏大王：“如何计教，得免其忧？”大王便语夫人：“后园之内，有一灵树，号曰无忧。”遂遣夫人，令往观看，得免其忧，遂遣排比后园观看。甚生队仗：[是日也]，数千重之锦绣，[张]万道之花筵。夫人据行，频（嫔）妃从后。

吟 圣主摩耶往后园，彩女嫔妃奏乐喧。

鱼透碧波堪赏玩，无忧花色最宜观。

喜乐之次，腹中不安，欲似[临]产。乃[遣]姨母波闍波提抱腰，夫人手攀树枝，彩女将金盘承接太子。

吟 无忧华树叶敷荣，夫人彼中缓步行。

举手或攀诸余叶，释迦圣主袖中生。

是时夫人诞生太子已了，无人扶接，其此太子，东西南北，各行七步，莲花捧足。

① [日] 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第40-84页。

② 王孟《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31-34页。

③ 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第409-413页。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口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吟 释迦慈父降生来，还从右肋出身胎。

九龙吐水早是泻，千轮足下瑞莲开。^①

这种韵散相间的讲唱体制，散文长行以叙事为主，介绍内容场景，叙述情节进程，表现对话与动作，交代前因后果等，有明显的口语特征；其中穿插的韵文偈颂则总结概括，重复吟唱，深化强调前文所述，描写心理活动与情感状态，有时也承担对话等功能，主要为七言或五言、六言形式，大多韵文前标有“吟”或者“吟云云”“吟咏”等字样作为偈颂的引导标识^②。经文前部先叙述佛陀前世苦修与善行，交代其成佛之因，随后有诗偈云：“不似听经求解脱，学佛修行能不能？能者严心合掌着，经题名目唱将来。”末尾解座文则道：“适来和尚说其真，修行弟子莫因巡。各自念佛归舍去，来迟莫遣阿婆嗔！”^③ 这些用语，更直接表明了其采用的讲唱结合形式，与当时流行的讲经文相似，也有人认为当属变文讲唱^④。其他类似内容的讲唱作品也有不少，如《太子成道变文》《八相变》《悉达太子修道因缘》等，但都称“变”或“因缘”，称为经的仅此《太子成道经》。

《佛说十王经》与此相似，但所讲内容为经文而非故事^⑤。据张总等学者研究，《十王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其经本复杂繁多，按题名、内容等可分为“四类十型”，最早为唐代前期的《阎罗王经》类，发展为《阎罗王授记经》，进而演化出具备诗赞、插图的《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简称《预修十王生七经》），成为《十王经》中流行最广的一大类，此外还有“其他语言文字的增变本”^⑥。这四类当中，作为《十王经》代表类型的《预修十王生七经》，署“成都府大圣慈寺沙门藏川述”，在原有经文及偈语的基础上，加入诗赞、插图，使之成为韵散相间、说唱结合并有变相插图的体式完备的说唱作品。法藏 P. 2003 号正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写本。其经题之前有一段话：“谨启讽《阎罗王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誓劝有缘，以五会启经入赞，念‘阿弥陀佛’”，表明它以讽诵讲唱的形式，用于五会念佛法会与丧葬斋祭等场合。以该写本开头一段为例：

《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

①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36页。

②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434-467页；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5-214页。

③ 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434-441页。

④ 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中所收该经残件（据北图潜字80号校录），就拟题为“佛本行集经变文”。见氏著《敦煌变文汇录》，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第107-124页。

⑤ 李小荣考察变相与变文关系时，引P. 2003号《佛说十王经一卷》之图文论证了僧家讲经时也使用变相的观点，即非故事类的变相也可配合讲唱。详参氏著《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14-126页。

⑥ 张总《十王经信仰：经本成变、图画像雕与东亚葬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第105-222页。

赞曰：如来临般涅槃时，广召天龙及地祇。

因为琰魔王授记，乃传生七预修仪。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鸠尸那城阿维跋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临般涅槃时，举身放光，普照大众，及诸菩萨摩訶萨、天龙神王、天主帝释、四天大王、大梵天王、阿修罗王、诸大国王、阎罗天子、太山府君、司命司录、五道大神、地狱官典，悉来集会，礼敬世尊，合掌而立。

赞曰：时佛舒光满大千，普臻龙鬼会人天。

释梵诸天冥密众，咸来稽首世尊前。^①

经文中，散文长行用于介绍背景、阐释义理、连缀情节，偈颂赞文用来重复吟唱、归纳强调，再穿插配以十几幅表现相关情节的插图等等。由此可见，这部伪经的宣传讲唱，是在僧俗共聚的场合中，由讲说僧人主导进程，宣讲经文，解说内容，引唱偈赞，并掌握节奏，指示众人根据经文内容进程观看相关图像，现场参与的众人也并非只是简单听讲，而是随着主讲者的引导，共同唱和，赞叹礼拜如仪。整部经文，变相与变文结合，生动表现出疑伪经在念佛法会与丧祭仪式上讲唱的情形^②。这与唐代变文的讲唱形式一致。这部伪经传至日本之后，日本僧人又据之编纂出新的伪经《佛说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仍然沿袭了这种韵散相间、讲唱与观相结合的体式。

仪赞祈愿类疑伪经，也多以念诵赞叹或者抄写供养的方式传播。如成于初唐的《佛说续命经》，经文并未按一般佛经的“三分”形式呈现，而是一开始便直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之名，祈求得到观音摩顶救护，以得解脱，然后赞叹观世音菩萨及西方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并发出15愿：

一愿三宝恒存立，二愿风雨顺时行，
三愿国王寿万岁，四愿边地无刀兵，
五愿三涂离苦难，六愿百病尽消除，
七愿众生行慈孝，八愿屠人不煞生，
九愿狱囚诉得脱，十愿法界普安宁。

眼愿莫见刀光刃，耳愿莫闻冤枉声，口愿不用违心语，手愿不煞一众生。总愿
当来值弥勒，连臂相将入华城。^③

敦煌保存的《佛说续命经》写本众多^④，其经文前后字句虽稍有不同，但这15愿的内

① 释文参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0-121页。校点稍有不同。

② 张总说：“《十王经》大约可定义为，以佛教名义（含有特别图赞形式）出现的一种丧仪规范，兼有活人为已预修功德的方式规制。”见氏著《十王经信仰：经本成变、图画像雕与东亚葬俗》，第3页。

③ 释文参李小荣《〈佛说续命经〉研究》，《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第72-73页。

④ 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51-252页；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第381-384页；李小荣《〈佛说续命经〉研究》，第71-78页；张立《〈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补遗》，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52、61、64、75、77、80页。

容是相同的。由抄写题记看，均用于除病消灾、祈福供养。其方式主要就是持念诵读或抄写供养。如甘博 016F《佛说续命经》开头：“有疑有难者，诵此经满千遍，即得解脱。”末尾又再次强调诵经千遍即得解脱的功效^①。S. 5679b 号末尾又加进写经的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年写此经，受持读诵者，延年益寿，灾障不侵。”^②

这类篇幅短小、称名祈愿的经文，整齐押韵的句式，显然就是为念诵赞叹而撰写，当属于民间讲唱的范畴。李小荣指出它还影响到净土五会歌赞，P. 3216《念佛赞文一卷》中的第 23-28 行全部抄自《续命经》的十五愿；S. 4504v-a 则摘取了其中的“十愿”歌辞；此外，《阿弥陀赞文》和《广法事赞》中的《西方十五愿》之名目，也似受此经之启示而来^③。

《赞僧功德经》也属同类。其经文内容乃中土僧人从《阿含经》中集出，改编为七言偈颂的形式，赞颂三宝当中僧宝的各种功德，反复奉劝世人敬重、供养僧宝，不得毁谤打骂。全文共 248 句，均为整齐的七言句式。节引部分如下：

殊胜妙宝大德僧，长养众生功德种。能与人天胜果者，无过佛法僧宝众。……
是故殷勤劝诸人，勿毁如来僧宝众。今生习恶因缘故，当来业成亦毁佛。缘兹身口
意业支，永断世间人天种，当堕三涂恶道中，亿劫沉沦无休息。^④

这部疑伪经显然也主要以诵读讲唱与抄写供养的方式流传。

敦煌佛赞与佛教音乐有密切关系。王志鹏指出：“敦煌赞文与偈颂比较起来，带有更多的音乐歌唱方面的特征。如许多赞文中都有和声词，常用叠字、衬字，或是在形式上具有一定套式，这都反映出敦煌佛赞歌唱的特点”^⑤。如《父母恩重赞》十三首，每首后带有“菩萨子”三字；《太子赞》二十七首，每首后均有“释迦牟尼佛”五字；《五台山赞》十八首，每首后有“佛子，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佛子”之类。这都是其音乐特征的明显表现。

（二）疑伪经直接发展演化为讲唱作品

这一类指的是，敦煌文献中既有疑伪经的文本，同时又有受其直接影响的讲唱作品，二者在内容来源上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学界对此类作品的讨论已有很多，我们这里只简单依照经典加以概述，不再详细展开。

（1）由《盂兰盆经》发展出的目连救母类讲唱作品。敦煌所存此类疑伪经，有《佛说盂兰盆经》《佛说净土盂兰盆经》《盂兰盆经赞述》等，而由这些疑伪经发展而来的讲唱作品，主要围绕盂兰盆节的来源，讲述目连救母的故事，如《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序》《盂兰盆经讲经文》《目连变文》《目连救母变文》《盂兰盆文》《七月

① 释文参李小荣《〈佛说续命经〉研究》，第 73 页。

② 释文参李小荣《〈佛说续命经〉研究》，第 73 页。

③ 李小荣《〈佛说续命经〉研究》，第 76-77 页。

④ 释文参王志鹏《佛教影响下的敦煌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59-264 页。

⑤ 王志鹏《敦煌文学与佛教文化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 年，第 170 页。

十五孟兰盆会文》，以及相关的《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左街僧录与缘人遗书》，等等。这类伪经及相关的讲唱作品流传极广，并不断编辑出新，如元代有《佛说目连救母经》（日本京都金光寺藏本）等，明清时期有众多的宝卷、戏曲、民间故事来演绎这个故事。

（2）由《父母恩重经》发展出的讲唱作品。该经有《父母恩难报经》《佛说父母恩重经》《报父母恩重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大报父母恩重经》等不同名称，敦煌保存的写本有60多件。写本以外，还有图画与造像形式的变相，以及口头讲唱的讲经文、歌赞等，如《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佛报恩经讲经文》《父母恩重赞》等。中国佛教影响所及之处，包括中国以及周边的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家地区，都可见到这部中国本土疑伪经的痕迹。可以说，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结合的代表性经典，当首推这部《父母恩重经》。

（3）佛传类疑伪经及其讲唱作品。讲唱如来成道作品的作品名目很多，如《八相变》《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悉达太子赞》《太子成道变文》《八相押座文》《须大拏太子好施因缘》等，它们的形成受到了佛传经典的影响自是无疑，但在内容上，与前述疑伪经《太子成道经》也存在密切关系，可视为佛传与疑伪经共同影响的作品。

（三）敦煌疑伪经间接影响的讲唱作品

这部分疑伪经与讲唱作品之间不是整体对应的关系，但存在一些间接或共同的影响，比如经文非整体而是部分内容与讲唱有关，或者经文的讲唱影响虽不彰于当世，却在后世有着明显的表现，可推知其民间的潜在流传与影响。

疑伪经的部分内容与讲唱相关的，可举随疑伪经流传的佛经灵验故事为例。这些灵验故事往往抄写于某些特定的疑伪经之前，为宣传其神通灵验而鼓吹张目，如《黄仕强传》，是为专门宣传《普贤菩萨说此证明经》而撰；《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是为鼓吹《金光明经》而造。它们除了随经抄写或編集流传外，还利用口头传播，通过唱导、俗讲等活动的口头讲说加以宣传。这类唱导、俗讲活动往往出现在八关斋会、礼忏法会、念佛法会、荐亡会等场合。郑阿财先生曾讨论过灵验故事在唱导活动中的作用，并提及法照五会念佛的过程中，穿插有关于法照与普贤、文殊菩萨面谈而授记偈文的灵验故事以及其在五台山的感通故事^①。按照荒见泰史的考察，灵验故事中有关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唱偈文的一段，带有深厚的讲唱文学的要素，其七言偈文亦见于五会念佛文的系统之中^②。

部分疑伪经讲唱的影响当世不显而后世乃彰，尤以《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称《孝顺子》）《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为代表。

^① 郑阿财《从敦煌文献论灵验故事在唱导活动中的运用》，《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142-148页。

^② [日]荒见泰史《敦煌本〈受八关斋戒文〉写本的基础的研究》，《敦煌写本研究年报》5，2011年，第129-150页。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自古就被当作疑伪经看待，但学者考察其实并非真正的疑伪经^①。敦煌存一件残本。国内文献中，除隋唐时代的经录有记载外，仅五代王仁裕笔记中提及“金蹄银角犊儿”的变相^②。但我们在韩国保存的朝鲜时代翻刻明本《释迦如来十地修行成佛记》（简称《十地记》）中发现了相关讲唱作品“第七地”（金犊太子），内容与敦煌本非常接近。该故事集编成于元泰定五年（1328），其流传当不晚于此时，笔者推测讲唱形式的底本宋代既已形成^③。此外，民间宝卷中的《金牛太子宝卷》与《十地记》中的这一部分也十分接近。毫无疑问，这些民间讲唱作品都是《孝顺子》影响的结果。此外，《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本生故事，如讲述摩耶夫人本事的鹿母供养辟支佛缘、婆罗门女骂母供佛缘，与《孝顺子》也有一定关系。

《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产生于北朝六世纪前半叶，敦煌文献中保留有10多个卷号的写本。南宋时期雕凿的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20号龕内，刻有该经的经文以及变相图。胡文和直接称之为“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变”，他认为根据宝顶该龕图文并茂的形式，全图应是唐代寺院用于“俗讲”的变文及壁画的衍生物，即“附有插图的变文”，并将此经变及宝顶所刻“报父母恩重经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观经变”等，统称为“刻在石壁上的（附有插图的）变文”^④。

要之，敦煌疑伪经中与民间讲唱关系密切者，多集中于信仰层面，且显示出更多的实用性与功利性；而偏重于佛教义理哲思的疑伪经，则相对较少运用讲唱形式。

二、通过讲唱所传播的疑伪经的主题

通过讲唱传播的疑伪经，有些内容主题比较明确单一，一部伪经仅关涉一个主题，也有一些疑伪经内容复杂，多重主题并存。今依其内容，归纳为如下几类：

（一）孝道主题

这类主题的讲唱作品，包含了前述《佛说父母恩重经》与《盂兰盆经》影响下的两个系列的讲唱作品，以及其它相类内容的疑伪经。这些作品，虽然出自不同的疑伪经，但主题与文化内涵，都是借佛教名义宣传中国传统孝道，通过报恩、救母这两个系列的故事加以体现。其中的报恩类讲述父母养育子女之种种恩德与艰辛，教诲人们报答养育之恩；救母类则通过目连出入地狱救护母亲的经历，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既有佛法神通，又符合中国孝道伦理的典范。郑阿财先生曾将敦煌文献中有关佛教徒倡导孝道的文

① 方广辑《敦煌写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简析》，《南亚研究》1988年第2期，第60-72页；《关于〈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若干资料》，《南亚研究》2007年第1期，第69-77页。

② 王仁裕《玉堂闲话》载：“（天水麦积山）其上有散花楼、七佛阁、金蹄银角犊儿。”见[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397，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181页。

③ 王晶波《从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到〈金牛宝卷〉》，《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3期，第77-94页。

④ 胡文和《四川摩崖造像中的“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变”》，《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第16-25页。

献从整体上分为两类，一为赞叹父母恩深以劝人行孝者，如《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十恩德赞》《父母恩重赞》《孝顺乐赞》等；二为称扬孝道典范，以导俗化民，行孝报恩者，如《二十四孝押座文》《舜子至孝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好住娘》《十二时行孝文》等^①。受此类主题影响的讲唱作品，还有用于盂兰盆会的《盂兰盆文》，以及数量众多的斋祭文如《亡考文》《亡妣文》《亡父母文》等。

（二）地狱十王主题

讲唱这一主题的疑伪经，以《佛说十王经》系列伪经为核心，通过对亡人死后在地狱中历经十王冥判过程的展现，宣传地狱恶报的恐怖，鼓励家属子女为死去亲人设斋作福，或者直接由生者个人事先预修，以求得摆脱地狱恶道，往生净土。这个主题关注人的生死问题，影响深远，流传广泛，形成了中古以来中国以及周边地区有关死亡的信仰与习俗。它将佛教的善恶果报、轮回转世、地狱观念与中国孝道传统结合起来，将佛教提倡的七七斋与中国儒家为亡亲守孝三年的丧制结合起来，形成十王斋之习俗。此外目连救母系列讲唱作品在努力劝孝的同时，也着重表现地狱三涂的可怕，并指出举办盂兰盆会及施舍以求功德的解脱法门。虽然目连故事中没有出现地狱十王之名目，但在表现地狱恶报、提倡斋僧法会这一点上，两类故事的实质是相通的。

（三）祈福灭祸与修功德主题

疑伪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用性与功利性强。它往往针对人们生活与思想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解释原因并给予相应的解脱之法。而普通民众对宗教的接受，也往往从它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益处开始，所以那些宣称能够祛病消灾、福祐平安的佛经就很受欢迎。按牧田谛亮的分类，这类主题涉及疗病、祈福的疑伪经数量最多^②。由传播形式来看，这类主题的疑伪经用于讲唱的也不少，前揭《佛说续命经》《赞僧功德经》等，都是围绕这一主题的。笼统而言，无论是正经还是疑伪经，只要诵读、抄写或供养，均被视为具有积累功德的效力，《太子成道经》《佛说十王经》《父母恩重经》《净土盂兰盆经》等经中均有体现。又如《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它借重流行的《大方广华严经》，其编纂的本意原在借用《华严经》的权威来强调断食酒肉的戒律和实践慈悲的重要^③，但在流传过程中，受社会文化需求的影响，其“文本性质和应用场景都发生了变化，被关注的重心从戒律向果报转变。”^④到唐五代时，这部伪经常与一些传播业报思想的经文如《佛说鬼问目连经》《敬福经》《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等合抄，成为祈福灭罪、去病消灾的功德用经，强调戒律的功能大为削弱。到南宋时期，其经文及变相

① 郑阿财《孝道文学敦煌写卷〈十恩德赞〉初探》，收入郑炳林、郑阿财主编《港台敦煌学文库》第67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② [日]牧田谛亮《疑经研究》，第44-84页。

③ [日]木村清孝《初期中国華嚴思想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77年，第112-113页。

④ 李奥、郑阿财《试论疑伪经文本的生成与流变——以〈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研究为例》，《敦煌学辑刊》2024年第4期，第65-77页。

被刻绘于大足宝顶山，成为宣扬地狱因果恶报的变文，显示出民间讲唱对其内容与传播的重要影响。

（四）菩萨信仰主题

敦煌疑伪经中有关菩萨信仰主题的讲唱作品，往往通过对菩萨的神通法力、名称、形象的描述，以及信仰该菩萨的各种方法如称名祈愿、持诵经典等所得到的感应与灵异事例，宣传该菩萨的神通、慈悲与有求必应。这种现象，在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信仰中都比较常见，而观音、地藏的信仰与崇拜在敦煌疑伪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观音信仰为例。如敦煌与日本名古屋七寺所存的《观世音三昧经》，通过佛陀与观世音、阿难三人的对话，借佛陀之口，宣扬以观世音为对象的观相法门，述说持诵此经可获得的种种利益，强调观世音菩萨在释迦牟尼之前即已成佛，名“正法明如来”，还说佛陀也是在行此经法七日七夜后方才悟道而得成佛，突出表现了观音菩萨与此经的至高地位与神通。其经文中有大段偈颂对观音所具神通加以描述：

佛告阿难巨思议，光明甚盛照十方。

摧灭三界魔波旬，拔除苦恼观世音。

普现一切大神通，受持斯经读诵书。

不堕恶道离诸见，七日七夜菩萨现。

手摩行人顶上时，行人心中无有疑。

又云：

佛告诸比丘，我念过去世，若行超九劫，初得菩提心，诵习斯经典，于其七日间，即得见十方，过去未来佛，悉现在我前，受持观世音，三昧正经典，由此成正觉。^①

前揭《佛说续命经》，开头便称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言“惟愿圣手摩我顶，救护娑婆世界重罪者，安着涅槃解脱地。”与《观世音三昧经》记载相类，都在宣扬观音菩萨的法力与救护作用。二者皆强调观音菩萨以手摩顶之功效，或存一定关联。

另如《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也反映了观音信仰的主题。经分三卷，上卷述观音菩萨的发愿、陀罗尼和此经所具有的灭十恶五逆、往生净国、女身转男身等功德益处，劝人持诵、供养、书写；卷中首题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疗病催产方》，宣扬此经可治难产和疾病，表现对妇女安全生产的作用；卷下为宣传佛顶心观世音菩萨救难的四则灵验故事，讲述供养、抄写、礼敬《佛顶心陀罗尼经》而得救疾、延寿、女身转男身以及免遭杀害的故事。郑阿财指出，其经的形成，受到了六朝以来观音信仰流行、唐代密教陀罗尼风行和中唐以后佛顶信仰风潮的影响^②。这些都是观音信仰的

① [日] 牧田谛亮监修，落合俊典編集《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第二卷《中国撰述经典（其之二）》，东京：大东出版社，1996年，第655-674页。

② 郑阿财《敦煌写本〈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研究》，《敦煌学》第23辑，2001年，第21-48页。

体现。

（五）降魔破魔主题

这类主题主要讲述佛陀及其弟子以禅定智慧法力战胜邪魔外道的故事。据载，释迦牟尼将成道时，魔王波旬派众魔前来扰乱媚惑，以妨碍阻止其成就正道，但终被佛陀一一降伏；还有须达长者起造精舍时遭外道干扰，舍利弗与外道斗法取胜等故事传说，都传播极广。《破魔变》《降魔变文》等讲唱作品，依据相关佛典记述以及当时流行的《太子成道经》等疑伪经内容，对之加以增色润饰来进行讲唱。其中有关降魔的部分，极力渲染佛陀法力与禅定慧力，刻画魔王与魔军的形象，展现斗法场面，十分生动。相关降魔斗法的描写，对后来的神魔小说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六）八相成道主题

这类主题主要讲述释迦牟尼的生平传记故事。佛陀事迹广载于佛典，并常被概括为“八相成道”，即降兜率、入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说法、涅槃八个阶段。中土僧人依据个人理解与生活经验，对此类故事重加摘编改造，形成相关的疑伪经及讲唱作品，主要有《如来成道经》《太子成道经》及《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八相押座文》《悉达太子赞》等。所述主要事迹、情节等大致与佛典一致，但细节方面仍有一些差异，显示出鲜明的中土特色，如净饭王梦见“双陆频输”；大王与夫人以歌舞娱乐、杯酒浇沃来祭天祀神求子；太子与耶输陀罗问答时，提到“三从”；太子出家时以玉鞭指耶输腹，使其怀孕，耶输生男后父王要推新妇入火坑以试其是否贞洁，耶输焚香发愿，世尊以法力使火坑变作清凉池等情节^①，均有中国传统风俗与民间传说的影子。

三、结语

疑伪经是佛教流传中国过程中，本土信众在接受其信仰观念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原有观念文化，假托佛陀名义而编纂的经典。其中，很大一部分疑伪经本身即以讲唱的形式传播，还有一些虽非讲唱形式，但其内容影响广泛，直接或间接地发展成为民间讲唱的重要内容。这一部分疑伪经及其内容，不仅构成了当时讲唱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影响之深远，超过疑伪经本身的存在，即便是宋以后疑伪经大都亡佚不存，但受其影响的讲唱作品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富有活力。因此，我们可以说，疑伪经为民间讲唱提供了重要的内容题材与形式来源，民间讲唱则为疑伪经的影响传播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对此加以考察，不仅对深入了解古代疑伪经与民间讲唱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认识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过程及其特点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观察视角。

^① 参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434-467页。